

从主体话语到文化启蒙： 论1980年代美学“译介热”的知识谱系

裴 萱

(河南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在1980年代“美学热”语境中,西学的“现代派”资源契合了思想解放的宏大语境。主体价值的确立、审美感性的彰显、个体的历史反思等等,这些不仅成为西方现代派美学的表征形式,更是成为中国新时期的理论诉求。“萨特热”“尼采热”以及“弗洛伊德热”就构成整个80年代美学维度“译介热”的知识框架。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浪潮作为译介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强大的哲学理念和现代派文学的推动,成为人学思潮中的“亮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通过对主体深层心灵活动的体察、泛性主义的生命欲求和精神世界的症候性分析,呈现出了主观色彩浓厚的美学面貌;“尼采热”的出现构筑了新时期译介活动的另一个热潮,伴随着尼采哲学论争的同时,也是唯意志论哲学和人本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化和张扬。由此,“译介热”走出了一条从主体话语确立到美学伦理建构的理论谱系,具有文化反思和人性启蒙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美学热”;“译介热”;存在主义;主体性;启蒙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8)01-0051-10

1980年代的“美学热”不仅通过对主体审美感性能力的发掘,完成了人道主义维度的文化启蒙;更是内蕴知识文化界的“现代性”焦虑,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等构成“二元对立”的结构框架。由此,西方科学、哲学、文化等知识资源便与新时期文化启蒙一道,共同获得了进入中国学界的入场券。一方面,政治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方针推动了中国本土的“译介热”浪潮,学界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文化交流中,弥合了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启蒙“焦虑”情结;另一方面,西学的“现代派”资源也契合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宏大语境,主体价值的确立、审美感性的彰显、个体的历史反思等等,这些不仅成为西方现代派美学的表征形式,更是成为中国新时期的理论诉求。“萨特热”“尼采热”以及“弗洛伊德热”就构成整个80年代美学维度“译介热”的知识框架。从文学

和文论的角度而言,在80年代出现了众多的现代性理论模式和与之相关的文艺作品,比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等等,它们都以不同的形式和内涵渗透进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而与之相关的美学和哲学思潮更是蔚为大观地译介进中国,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形式主义美学、结构主义美学等纷纷以人的存在、主体的价值、美学的独立与自律、个体的反思、方法论的实验等维度契合了80年代新启蒙时期的思想浪潮,以系统的理论建构和知识学资源给“美学热”的人道主义维度、美学意识形态对抗和主体的审美话语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弗洛伊德对个体无意识心灵世界和“力比多”的发掘、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和悲观主义、尼采个体化和自由化的“酒神精神”、萨特的“存在决定本质”等等都给予从政治规训中解

收稿日期:2017-05-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BZ00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CW027);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16-qn-08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6M59227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7T100527)

作者简介:裴萱(1985—),男,河南郑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放出来的知识青年以精神舒张的契机。对于美学资源的译介也出现了若干影响重大的“译丛”,比如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和甘阳以及“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较具有代表性,基本涵盖了西方现代美学史上的重要理论和流派。《美学译文丛书》总共出版了49本,更加侧重美学的学科性和理论性,桑塔耶纳、科林伍德、苏珊·朗格、伊瑟尔、沃林格、巴特、贝尔等著作都涵盖其中,可谓勾勒出了西方现代美学的基本线索;而《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则更加重视西学资源的哲学性和学术性,并以现代性启蒙的姿态充满热情地向西学“取经”。甘阳曾经回忆道:“不过伯林是我第一个引进的,那篇文章主要是引进关于‘两种自由’的概念。……首先是一个精神界的自由,积极的自由,是一个全面的人的自由”^[1]。知识精英的现代性反思和启蒙贯穿了整体编委会的价值取向,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等都构成了译介的主要对象。由此,对西学资源大规模的译介就成为“美学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知识学资源,并且给人道主义的启蒙思潮、个人话语与主义话语的对抗、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对抗等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也延展了启蒙现代性的理论脉络。

一、“译介热”的生成:个体主体性与“萨特热”的知识谱系

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以来,文艺界和美学界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文论和美学资源的译介工作逐步开展,形成了大规模的“译介热”与“翻译热”。伴随“美学热”的论争、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告别历史的启蒙话语,知识分子逐步意识到僵化的意识形态反映论和绝对客体论的审美样态已经跟不上文艺思潮和思想启蒙的需要,也无法对新的文艺现象进行阐释。而西方的文学与美学资源则开启了主体另类的思考方式,成为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消褪之后的、对自我和主体重建以及深化反思与批判意识的知识学资源;尤其是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大量译介,给中国文学界和美学界提供了大量的审美方法和思考空间,并且消解、弥补了一直以来的审美原则:比如从哲学基础而言,文学和审美从反映现实、服务政治转向了主体个体的话语言说,从机械反映论转向了

主体表现论(或主体实践论);从审美的表达方式而言,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转向了语言游戏和形式实验,艺术形式逐步超越思想内容;从文艺的价值取向而言,从意识形态的“高、大、全”理想转向了个体的生存体验和文学是人学的价值承担。所以,西学资源消解了正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审美模式,丰富了文学和审美的样态,增添了文论和美学的阐释空间,从而促使了多元化和自由化美学场景的出现。正是在此语境中,大规模的译介工作有序进行,据统计,“1978-1987年间,仅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译著,就达5000余种,大约是这之前30年的10倍”^[2]。译介活动不仅仅成为现代性启蒙姿态下的文化传播和理论焦虑,更是知识分子重掌话语权进行美学启蒙的文化表征,成为“美学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美学思潮的角度而言,出现了若干重大的译丛,比如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王春元等主编、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甘阳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社科院外文所主编的《当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等,基本覆盖了西方美学尤其是现代美学的主要理论,新的美学内涵、新的人文价值取向、新的艺术形式、新的美学研究方法论都有所涉及。同时,这些丛书的译介编写者也多是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对知识的传播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如朱光潜、李泽厚、甘阳、钱中文、周国平、徐友渔、刘小枫、陈嘉映等都先后参与了译介工作;而从现代派文学作品的译介角度而言,同样出现了蔚为大观的场景。《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译林》《外国戏剧》等刊物集中刊载了现代派文学作品,并且经常以“专辑”的形式对某位作家的作品进行集中刊发,博尔赫斯、萨特、金斯伯格、乔伊斯等名家作品得以集中译介。“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八零年初为止,除了外国文学的专业刊物外,发表外国文学作品和评论的其他文艺性刊物,有八十种之多(有的还出版‘外国文学专号’);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零年六月止,在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有关外国文学的论文有一千二三百篇。”^[3]而与此同时,文学出版也加强了对外国文学图书的重视。新时期较早对现代派文学进行集中整理的是袁可嘉、郑克鲁等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其一二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在1980年和1981年公开

发行出版,引发了社会上巨大的反响,现代派“就像是另一个星球一样陌生而遥远”^[4]。随后,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译介依然是由几个大型的丛书承担,比如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漓江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四川文艺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诗人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等,纷纷对表现主义、意识流、未来主义、荒诞派文学、新小说、垮掉的一代、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系统的译介,也从文学表现、审美技巧、主体心灵等维度给予中国读者和作家以崭新的启迪。总体而言,无论是文论和美学思想的引入,还是现代派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大规模的译介活动同样呈现出了个体主体话语的生成、审美与意识形态的自我反思、美学知识场域的确立,从而构筑了呈现出中国文化语境特质的理论价值与美学启蒙。

从个体主体的文化反思而言,西学资源的引入呈现出对主体、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等问题的关注,将“文革”时期的极“左”政治话语转型为凸显个体和人性存在价值的“自我”,从而构筑1980年代新时期“人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现代非理性的人文主义思潮不仅仅给人道主义大讨论提供了启蒙现代性的理论支撑,更成为了广大知识分子有意的理论选择。以萨特、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以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等都深刻影响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学青年的价值取向。对于刚刚从“文革”的政治神话和人性摧残中走出的一代人而言,他们对于历史的反思和人性的渴求已经远远超越了理性化的学科建设,美学的个体体验、自由理念和感性原则业已成为对抗“极左”意识形态的“美学意识形态”。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唯意志论等纷纷给予个体话语以强大且丰富的知识学资源,并且秉承了西方审美现代性的反叛理念,从而对霸权统治与主体异化进行有机的调整,这也契合了“美学热”的整体历史价值与发展走向。无论是存在主义的“存在先于本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还是精神分析学派对主体深层心理与个体欲望的表露;无论是唯意志论哲学的“超人意志”,还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勇气,都表达出对压抑人性霸权的“极左”意识形态的对抗。

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美学浪潮作为译介热

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强大的哲学理念和现代派文学的推动,成为人学思潮中的“亮点”,“萨特热”更是社会广大青年对其的肯定。新时期最早对萨特作品进行译介的应当是林青教授翻译的《肮脏的手》(《外国文艺》1978年7月创刊号),而这部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反共”的政治剧不仅在中国得到了公开发表,并且在1981年被胡伟民导演改编并搬上了戏剧舞台,从而造成了更大的影响。由此,对萨特的充满争议性的评价也一直贯穿了80年代的始终。真正使得萨特进入中国并且被广泛接受的当属柳鸣九先生的努力,他在1978年举行的外国文学第一届全国工作规划会议上贬斥了长久以来在文艺界横行的“日丹诺夫论断”,提倡对以萨特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学”进行重新评价,其“主体自由选择”“存在先于本质”高扬了个体的自由性、选择性和能动性,成为了人道主义“个性自由论、个性解放论的一种新的形式”^[5]。这篇学术发言《现当代西方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以此发言整体出来的长篇论文《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载《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期和第2期)以及后来组织的《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笔谈文章被柳鸣九本人称之为萨特研究的“三箭连发”,开启了对萨特译介的声势与先河。1980年4月15日,萨特的逝世不仅引发了学界对存在主义理论的回忆与重视,更是引发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关注。《人民日报》分别在4月15日、17日发表萨特逝世和悼念的消息,并在5月5日发表张英伦的《萨特:人类进步的朋友》一文,肯定萨特的历史地位和“中国人民的朋友”,这些都为萨特译介热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空间。随后,萨特的文学作品《禁闭》《恭顺的妓女》《墙》《一个厂主的童年生活》《死无葬身之地》;文论文章《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意识形态》《忠诚与怀疑精神》《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七十岁的自传——让-保尔·萨特谈他的一生》等纷纷译介并发表在相关的外国文学刊物上。对于国内的学术界而言,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与哲学是一种积极“行动”和“入世”的理论表达,并且以人道主义的视角倡导主体自由、全面的发展,控诉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本质的戕害与异化。萨特作品译介的初期依然存在于政治规训和人道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框架之中,在客观上起到了纠正“文革”遗毒的作用。自新时期以来,萨特的作

品和哲学思想被大规模引进中国,这其中既有着中西文化现代性比较的“焦虑”,同时也是直接契合了学界和社会对于人的存在、人的价值等问题的追问。萨特的文学中高扬了人的自身异化、主体的自由选择以及对抗社会现实的自由,这些都被中国读者视为恢复人的尊严的价值取向,二者在“反思人性”的层面上达到了契合,“1976年以后,萨特最初是作为作家介绍给中国文学界的,他的作品描写了人的异化、人与社会的格格不入,并主张恢复人的尊严,这一切均与当时崛起于中国文坛的‘伤痕文学’一拍即合。”^[6]随后的1981年10月,柳鸣九编译的《萨特研究》的出版则进一步深化了人学的脉络,同时也强化了主体的生存自由和自由创造,肯定了个体独立性存在的价值与自我选择、掌握自身命运的信念。该书对萨特的译介主要分成了文论选、作品选、作家批评家对萨特的评论、萨特的生平与文学创作背景等几个不同的版块,收录了《七十岁自画像》《苍蝇》《恶心》等名篇,同时也对萨特的生平、创作背景以及存在主义其他的相关作家进行了勾勒,呈现出对萨特文学、哲学思想全面而又具有重点的把握。在注重学术性的同时也更加看重思想性和普及性,在学界与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回响,直至当今也成为研究萨特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对萨特作品的译介进入了更加系统和完善的时期,许多专著也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译介。无论是哲学和美学,还是文学和文论,都得以进入中国新时期的知识话语系统之中。与前期相比,对萨特的研究也更加重视“以个人主观意志论为基础的存在主义哲理”,个体的自由性色彩更加浓厚,逐步替代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取向。从哲学著作而言,陈宣良等翻译的《存在与虚无》成为该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该译本同样也是作为“中国:文学与世界编委会”《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在1987年三联书店初版时印刷了37000册,堪与畅销书相媲美。也许“虚无”契合了“文革”以来学界和民众的心灵需求,晦涩难懂的语言也丝毫没有影响大众的热情。198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更加契合了“美学热”和“人道主义大讨论”的浪潮,也坚定了学界以人学改造学术、启蒙民众的信心,正如汤永宽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认为的,萨特的哲学并不是消沉、悲观厌世的话语系

统,而是具有积极介入精神和反抗斗争精神的“乐观”哲学,并能够启发和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从美学和文论的角度而言,萨特有关论述“想象”的《影象论》(《想象》)和《想象心理学》分别在1986年和198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而冯黎明、欧阳友权翻译的《萨特论艺术》则是该时期萨特美学研究的“集大成者”,该书在1989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译自美国巴金斯编选的《萨特美学论文选》,强调了美学研究的行动性、选择性与介入性。从文学的角度而言,数量上则更为丰富和多元,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萨特戏剧集》、安徽文艺出版社的《魔鬼与上帝》、作家出版社的《理智之年》(《自由之路》三部曲的第一部)、三联书店的《词语》、河北人民出版社的《萨特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厌恶及其他》等,分别涉及到了戏剧作品、自传体小说、长篇小说等方方面面。通过文学的形象表达和审美体验,更加深化了萨特的“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主体自我选择、自我确证的价值取向以及对生存无意义的荒诞感知,成为另一条衡量存在主义思想的人文标尺。由此,萨特的文艺思想基本上已全面译介进中国,并同“美学热”一道塑造了“萨特热”的社会景观。

“文革”之后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正是与“二战”后西方学术界的理论取向构成了相互呼应的二元同构关系,所以“萨特热”到“存在主义热”都可以看做是主体反思历史、彰显人性、重塑信仰并且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表征。在“文革”意识形态坍塌之后,他们急切而焦虑地需要找到重塑精神理念的新思想和以“个人”介入社会的新方式,那么萨特的译介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有意选择,更成为了整个社会所关注和秉承的话语资源。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文化和个体“启蒙”的主题一再被民族“救亡”的主题所压倒,启蒙、人性和主体已经被集体主义取代和消泯。80年代新时期以来,“新启蒙”再次呼应了“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的个体启蒙精神,有关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论争就成为恢复启蒙传统的应有之义,也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得以广泛译介和传播的根本原因。在存在主义看来,存在哲学首先正是一种“人本哲学”,“存在先于本质”是其核心理论支点,也就意味着主体的存在是本源,是“在前”的;而主体的本质和自我定义则是“在后”的。“从他被投进这个世界的

那一刻起,就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7]。所以从哲学维度而言,个体存在的本质正是在于自我选择的自由,构建一种以“孤独个人”为基点的人本主义哲学;而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应该首先彰显出人物的自由存在状态,进而再去通过性格、命运、叙事等手法以及崇高、喜剧的审美范畴完成主体的本质,荒诞、虚无、孤独就成为了主体不可摆脱的宿命。所以萨特自己的《恶心》等文学作品正是该文论的最好实践。存在主义对主体生存状况的反思、对其自由的向往以及介入现实的尝试都与中国80年代新启蒙的语境不谋而合。

从人道主义的论争到“美学热”的兴起、从李泽厚的主体论实践哲学到文艺美学和实践美学的建构,“人学”视域下个人与国家的对抗始终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于是,在理论的“共鸣”中,萨特成为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的主动选择,主体性、自由性、人文性在萨特的理论中有了广泛阐释的空间和知识学资源。而同样,萨特的理论最先译介到中国之时,也被更多地集中在人道主义和人的主体性维度,试图通过西方的哲学话语重建个体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从而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出身论、宿命论和阶级论对抗,恢复人性的自然面貌和能动性实践的本质。所以,萨特的诸如“自我选择”“存在先于本质”等理论与其说是从哲学层面对主体“焦虑”和“荒诞”生存的拯救,不如说是给中国知识青年提供了崭新的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方向。当意识形态神话的理想坍塌之后,萨特的哲学思想成为拯救价值危机的一剂“良药”。所以,受到萨特一系列哲学和美学理论的鼓舞,许多大城市的高校学生和知识青年纷纷从政治理想坍塌后的焦虑中跳出来,开始进行了“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奋斗”且实现“自我价值”的历程。“潘晓现象”所引发出来的对主体存在价值的拷问彰显出了青年人的焦虑与反思,而萨特理论中荒诞、虚无的思想理念印证了“文革”之后广大青年的心灵与精神状况,这种强烈的不确定感和对政治乌托邦的失落共同促成了萨特成为一个时代青年人的精神导师。而主体也正是在荒诞与虚无的认知与反抗中,实现自身存在的自由价值。所以,当时一位高校学生认为:“当我刚接触萨特存在主义时,精神为之一振,觉得它很深刻,以哲学的语言说出了人生的真谛。”^[8]其次,萨特的自由选择观也契合了新时期青年对自身信仰的重新定位。当“极左”意识形

态规训转向更加务实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知识青年也将宏大的理想信念建构在自身的价值实现之上,希望剥离狂热的意识形态热情,从而转向更加真实、丰富的自我。面对多变的中国现状,如何反思并评判“文革”历史?如何在主体的精神危机之上重建信仰?如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浪潮中确立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些问题与思索恰似西方“二战”后的精神危机,所以,萨特此种既体察虚无与荒诞,又高扬主体的存在精神,既强调对社会霸权的反抗,又以自我奋斗的“介入性”完成主体的生存价值,启迪了新时期以来青年特有的“自我觉醒”,伤痕文学、朦胧诗、先锋小说、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以及流行音乐、通俗文学等都与其有着或隐或现的密切联系,映射出一代人的精神律动。虽然“萨特热”伴随政治意识形态的打压、个别青年的“自我毁灭”例证以及新启蒙在商业浪潮中的分化而遭受冷落,但此种心灵的律动和人道主义的有意选择,则从历史的层面进一步加深了人道主义和主体性哲学话语,也不断丰富了“人学”的脉络。

二、“译介热”的深入:审美感性与“弗洛伊德热”、“尼采热”的理论融合

从主体心理学的层面而言,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通过对主体深层心灵活动的体察、泛性主义的生命欲求和精神世界的症候性分析,呈现出了主观色彩浓厚的美学面貌。文学和审美正是起源于主体的无意识本能和类似于性欲的宣泄,是“本能”的一种释放与升华。文学和文本也正是主体“白日梦”的变形,“有一些小说——我们可以称之为‘古怪’小说——看来同白日梦(daydreams)的类型形成很特殊的对比。……在这些作品中,自我以扮演旁观者的角色满足自己。”^[9]可以说,弗洛伊德以主观研究的视角和人类本能情欲的释放完成了具有人本意义层面的个性解放。而这一过程从潜意识、前意识到意识,完成了自然欲望向道德境界和社会规训升华的过程,主体的心灵活动成为推动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的源动力。“无意识”与“本我”的深层内心体验将艺术的本质与表现从外在的客观世界转向了主体内在的、隐秘的心灵结构,体察出创作主体、文本和形象主体的精神世界。精神分析理论适应了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进程中主体自身压抑与抵抗的话语诉求,并且成为了“非理性转向”的

重要组成部分。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梦的解析》直接奠定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基础,并且开启了哲学和文化领域对主体内在精神世界、感性力量以及无意识领域的关注,促使20世纪上半叶的美学和文论出现“人学转向”与“非理性转向”的谱系流变。弗洛伊德将主体的无意识活动、梦境的符号学阐释以及“力比多”个体欲望的分析,纳入进主体审美活动的场域中,从而具有现代性文化启蒙的意味。与此同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拉康的“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理论、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社会学”理论等等,都从知识的不同纬度延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给主体的感性自由和历史文化批判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无论是文学中的意识流呈现,还是哲学领域的感性确证,精神分析理论都强调了个体本能和感性能力的“自然权利”地位,拓展了文学和审美表现的空间。

其实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国学界并不陌生。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学界出现过一次热潮。郭沫若的《残春》《月蚀》,鲁迅的《弟兄》《肥皂》,郁达夫的《沉沦》《茫茫夜》,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施蛰存的《石秀》《将军底头》《鸠摩罗什》等等,都在文本中注入了主体精神世界的焦虑和欲望情感的纠葛。同样,从文论的角度而言,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高觉敷一系列阐释精神分析的论文等都基本上涵盖了弗洛伊德的主要理论观点,并且还以中国式的话语方式对其进行了适度的融合与改造,从而适应新文化启蒙的诉求。而80年代新时期出现的第二次“弗洛伊德热”从历时的角度而言,衔接了“五四”的人学启蒙传统,再次激活了复归人性的话语尝试。自“萨特热”之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结构、白日梦理论以及“力比多”的本我欲望等都成为哲学界和文艺界热议的话题,更成为了广大文学青年追寻自由、倡导个性所追寻的对象。弗洛伊德的论著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出版浪潮,其专著和相关的研究文章也纷纷译介到国内或者再版。1981年,李泽厚主持的“美学译文丛书”就收录了《弗洛伊德论美文选》,重点将弗洛伊德理论中同文学创作和审美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译介,促进了“美学热”的进程;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高觉敷翻译的《精神分析引论》,这也是新时期以来最早正式译介的弗洛伊德专著,截至2005年不断重印了

13次,成为了研究其思想较为重要的理论选本;随后的几年间,《图腾与禁忌》《超越快乐原则》《性学三论》《自我与本我》《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等重要论著纷纷由作家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出版,其中由车文博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几乎涵盖了其所有重要的专著和论文,系统地阐释了其理论发展的脉络。同时,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专著也纷纷出现,影响较大的有余高凤的《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文学》、乐黛云的《潜意识及其升华——精神分析与小说分析》等等。如果说“五四”时期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引入在于人学启蒙和西方理论的新奇化接受,那么80年代新时期则仍然是知识界在启蒙基础上对理论的有意选择,非理性、本能式的理论框架模式再次契合了从“极左”意识形态高压下解放出来的主体性人性诉求,不仅仅在文论界和文学界引发了热潮,更是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引发了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购书热”和“读书热”。比如80年代末在对南方某省的高校学生调查问卷中得出:“1985—1986年,西方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说’更被许多青年学生视为探索人的心灵奥秘以至社会发展动力的灵丹妙药”,甚至成为“许多青年学生的案头必备书”^[10];而在对北京高校的调查统计中发现,弗洛伊德理论契合了“人性即人的自然本性”的理论架构和人道主义思潮的不断深入,从而为人性的舒张与主体自由的回归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一些高等学校,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泛性论’在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11],与此同时,其他省份高校的调查统计也有着相似的结果。同时,在各大高校也出现了有关弗洛伊德学说的演讲热和讲座热,大学生们纷纷表现出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兴趣。弗洛伊德理论对中国的主体性理论和人性理论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从美学和文论的角度而言,进一步纠正了机械反映论对文艺活动的统摄,以“文艺心理学”的视角介入到审美活动之中,试图发现从文艺创作到文艺接受之间主体精神活动的奥秘。比如金开诚在文艺心理学领域中的探索,鲁枢元的创作心理学、精神生态学的研究等等,都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针对具体的审美活动层面,孙绍振、谢冕、徐敬亚等从文学批评入手,对崭新的意识流文学和朦胧诗等进行分析与阐释。孙绍振的

《美的结构》正是融合了传统的反映论文学观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从而建构了“生活”“自我”和“审美规范形式”的几重结构,其中的“自我”正是指向了创作者的心理结构、心理创造等内容。而受精神分析学说影响最大的,仍然是文学创作领域。首先是对“力比多”和“性”的原始能量的展现与表达,以充满个性的本能欲望和自然属性渗透到文学中,并以此成为对僵化保守的文艺指导思想和“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塑造进行反拨与调整。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虽然秉承了反思文学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但是“反思”的焦点却祛除了道德理念式的说教,而是以人的自然之性和生理本能成为人生坚守与告别苦难的基点;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小鲍庄》《逐鹿中街》等作品中淡化了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而是以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角色完成了故事的推进和命运的无常,揭示人类主体生存的困感与无奈。其次,意识流文学和朦胧诗的出现,也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蒙《春之声》中岳之峰跳跃式的自由联想、残雪《山上的小屋》中噩梦式的话语和对亲情伦的拆解、莫言《红高粱》中男权世界的生命本能、朦胧诗中非逻辑的形象表征和潜意识的流动,都体现出“潜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巨大魅力。其实,对弗洛伊德的接受依然存在于个体与国家、审美与政治的二元对抗关系之中,依然可以纳入新时期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启蒙范畴。当然,面对弗洛伊德主义所涉及到的诸如个人中心、本能需要、性爱解放种种负面因素,我们依然要将其放在整体的历史宏大语境之中。正是因为“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话语成为规训一切文化价值取向的神圣法则,个体已经完全消泯在集体和革命的神话之中,所以新时期以来一定程度的“个性解放”就呈现出人道主义向度无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

相比较“萨特热”和“弗洛伊德热”,“尼采热”的出现构筑了新时期译介活动的另一个热潮,伴随着尼采哲学论争的同时,也是唯意志论哲学和人本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深化和张扬。同样,从历时的角度而言,近百年对尼采思想的译介也经历了三次热潮。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到二三十年代,启蒙的“觉醒者”们试图通过尼采学说中的反叛意识与进取精神,打破僵化保守的复古派、国粹派、国故派对人思想的禁锢,通过借鉴

西方民主、科学与自由的思想实现新文化运动的深入。第二次尼采热的浪潮是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尼采的学说与政治紧密地绑定在一起。无论是国统区“战国策派”宣扬的“强力”专制统治,还是进步人士所坚信的尼采与法西斯思想之间的联系,都成为阶级利益与政治需要的工具。新中国成立以来,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再次将尼采与独裁、专政的法西斯联系在一起,基本上对其持批判态度。第三次尼采热当属80年代新时期对尼采价值的重估,尤其是在学术界、知识界和大学生群体中,尼采的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酒神冲动等思想再次同人道主义浪潮相结合,成为增强个体主体性能力的理论基础。学理化的特征不断明显,从而逐步超越了政治性的话语言说方式。其实,无论尼采理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呈现出何种风貌,都与其相应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密切相联,更是与思想启蒙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尼采全部思想的核心观点正是“强力意志”,人生而是痛苦的,酒神精神是在沉醉中实现意志的初步解脱与人生超越,艺术也正是暂时使得痛苦得到解脱;“超人”则是权力意志的全面升华,是人类主体的力量不断扩张和超越的结果。在此种超越中,传统的价值伦理、道德理性、教育禁锢、神权规训等等都被打破和重估,主体也充满了强烈的反抗情结与进取意志。而“五四”时期的王国维、陈独秀、沈雁冰、李石岑、鲁迅等学者正是着眼于“重估一切价值的反叛态度”和个性进取的精神,从而试图完成文化启蒙的需要。王国维曾赞叹尼采充满进取精神的人生意志,并定位其为“一最崭新、最活泼、最合自然之新文化”,“如尼采氏者,其观察敏锐,其用语新颖,其立想奇拔,其行文痛快,实足以发挥其天才而有余”^[12],将尼采看做是破除封建桎梏、实现社会进步的理论前行者。其《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尼采氏之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都是对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意义重估;鲁迅以“斗士”的精神完成了对尼采精神译介与继承,《破恶声论》《随感四十六》《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等都是其集中体现;而沈雁冰在著名的《尼采的学说》中认为其理论最大的优点在于破除古典社会中一切具有强权性质的政治框架和道德信条,对一直以来信奉的绝对真理采取怀疑的态度,从而实现从古典时期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其次,尼采的“强力意志”精神在“五四”时期也被阐释为个体的进取精

神和自由的人文主义理想,并以此来实现新文化的启蒙。陈独秀的《人生真义》、李石岑的《尼采思想之批判》等论文都提倡了生命的扩张和主体精神的力量。最为显著的当属鲁迅《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的“非物质、重个人”的思想,高度提倡了主体的精神力量和个体改造世界的愿望,这也是对尼采强力意志思想的变换与改造。“若夫尼法,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13],尼采成为个人主义价值的宣言,整个《文化偏至论》甚至都成为了借鉴尼采并且“重个人非物质”的引介文本。80年代新时期对尼采思想的译介则与“五四”时期再次形成了具有相似性的同构关系,其主要立足点依然是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反叛性”和“强力意志”精神两个维度,并且成为人道主义和人学向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美学热”的进程和朱光潜、汝信、张汝伦、周国平等学者的推动,尼采逐步摆脱了“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外衣和“反动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定位,以学术的姿态回归学界的研究和译介之中。汝信先生曾在1985年举办的高校美学教师第三期进修班上发言:“在我看来,目前我们需要的首先是真正理解尼采,去全面地、如实地、正确地理解他,而不是为他辩护,更谈不上什么翻案。在历史的审判台面前,每一个思想家都要受到实践的裁判,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绝不是弱者。”^[14]随后,张汝伦和周国平也纷纷撰文,为尼采哲学进行“翻案”,肯定其积极的主体价值与人性内涵,“尼采其人其说的命运使我们看到了某些人轻易地制造了偏见”^[15]。在“正名”和“翻案”之后,学界系统地对尼采进行译介和研究。安延明编译、乔治·勃兰兑斯著的《尼采》在1985年得以出版,此中译本使广大社会和学界系统领略了尼采的思想和经历;周国平则是系统译介尼采思想的集大成者,《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偶像的黄昏》先后在这一时期译出,基本涵盖了尼采思想的主要脉络;同时还出版了研究性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持续深入地对强力意志和酒神精神进行阐发,并且直接带动了第三次“尼采热”的浪潮。“当我在1985年初写作那本论尼采的小册子时,我不曾料到,两年后会在中国出现一小阵子所谓‘尼采热’。”^[16]那么,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心态正是新启蒙的“焦虑”和新时期的“精神危机”,新兴的“个人话语”与长期以来意识形态的“主义话语”产生

对抗,尼采恰恰契合了此种文化风尚并成为“个人话语”的理论基石,并且以强力的进取意志完成了主体性的建构。

从“个人话语”的角度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新旧思想、中外文化、传统和现代、民主与霸权等相互胶着,此起彼伏;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的话语空间,初具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并以人道主义浪潮和人性人学的回归实现对历史的告别和主体性的彰显。与此同时,对“极左”意识形态的调整使得社会暂时产生了“文化归属的真空”,个人财富的追逐和庸俗物质主义的盛行又促使个人主义作为保护牌。所以,这几种力量的胶着和信仰的矛盾就产生了学界与社会的“虚无”与“批判”,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中也产生了积极与消极、奋进与纵欲、拼搏与苟安、精神与物质、希望与悲观等相互矛盾和纠结的心理。在此“精神危机”之中,尼采的强力意志、反叛精神和重估价值的理论都给予知识分子强大的精神支撑。信仰的失落需要“重估一切价值”,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体性的彰显需要“酒神式”的自我认同,改造社会和进取的力量则需要“强力意志”的投入精神。由此,在对尼采的译介和接受中,人们得以摆脱虚无和彷徨的信仰真空,进一步加强了人道主义思想内涵与社会价值。“尼采热在大学生中的确存在,但其热度却因学校、专业和年级等有所差别。据京、穗的调查,尼采著作最虔诚的读者是本科生。北京大学某系86级,60%的学生拥有一两本尼采的书,85%的同学看过尼采的书。”^[17]尼采理论中对个体自由力量的确证以及积极介入现实的努力都为正在探索人生、重塑价值理想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提供了参照的思路,从而以非理性的个体意志完成了个体主体性的建构。所以,在此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和社会现实的影响中,学者们也纷纷从“重估价值”“超人的强力意志”等两个维度进行研究,从而衔接了“五四”时期的人学启蒙浪潮。比如周国平的《“上帝死了”——论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刘亚凤的《“重估一切价值”的价值》、王克千的《简评尼采的价值观》、赵勇的《从〈悲剧的诞生〉看尼采的悲剧观》等论文着眼于对历史、政治价值的重估,以此来试图建立崭新的个体信仰;而张梦阳的《略论尼采的“超人”哲学在文化巨人崛起过程中的心理作用》、赵修义的《试论尼采的认识论》、陈鼓应的《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周国平的

《尼采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等则将强力意志同中国的语境结合起来,从而发掘个体在未来社会文化建设中的责任与担当。对于尼采的兴趣和研究一直延至90年代初期,也正是因为得益于人学脉络的加深和介入社会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以及运用意志力和想象力所创造的出来的人生理想和世界美景,这些都给予了80年代“激情体”学术以更为宽广的思想空间。

三、结语

西方文学和美学理论作为一种知识学资源,曾经在“五四”时期成为思想和文化启蒙的浪潮,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宗白华、朱光潜等美学家都积极引介西学资源,同时以中西融通的视角完成中国美学的建构和改造过程。而伴随着“文革”意识形态规训的不断加强与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的改造,对西方学术的译介曾一度归于沉寂。1980年代新时期以来“美学热”的出现则再次激发了西学资源的“传播”进程,并且给予了中国“现代主义”和“现代性”启蒙思潮的合法化存在空间。众多的文学家、美学家和理论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和知识启蒙的精英性地位,他们纷纷以现代性文化启蒙的方式试图重新建构极左政治神话坍塌之后的主体信仰,而以现代主义为主要内涵的现代西方学术资源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合法化”的理论武装。一方面,西方技术理性、文化思潮及学术规范符合新时期以来“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意识形态需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等政策方针给予了知识界引介西学资源以宏观的政策保证。不仅仅是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们的文化成果和学术资源同样以现代性启蒙的姿态为中国的人文社科界所译介与接受;另一方面,“文革”结束后政治神话的消解引发了社会对人性的反思和现代性的焦虑,知识分子也纷纷以批判和启蒙的姿态解构“文革”时期的极“左”意识形态,“美学热”也恰恰构成了文学和美学界的话语焦虑和人道主义表达。而对西学资源的引入,则适当缓解了学术界“落后的焦虑”,无论是现代派文学对人性的焦虑,还是存在主义式的人生价值拷问;无论是“文学现代化”的朦胧话语,还是“审美现代性”的形式技巧,都隐含着文学和美学的现代化诉求。

西学资源不仅仅是被译介和学习的对象,更

是同“五四”救亡图存精神一脉相承的启蒙热情和文化自救。所以我们不仅仅看到了大量文学领域朦胧诗、新潮小说、寻根文学、实验戏剧等现代派特色的文学形式出现,更是在文化领域中出现了“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等非理性文论浪潮;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美学理论和流派也持续而深入地影响到中国当代文论和美学的建构,并且与实践美学合流,从而生发出生命美学、后实践美学等更具有个体化和体验式的美学样态。美学的介入性和意识形态性大大增强,“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抛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18]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新时期以来的知识启蒙和当时的意识形态目标构成了最初的同构性关系,其旨归都是为了建构一个现代性民主、自由和文明的民族国家。当然,伴随历史性的进程,二者之间的同构性关系逐步趋向破裂,知识启蒙也面临审美文化、消费伦理的侵蚀,并在90年代以后走向了实用主义。而无论结果如何,80年代对西方学术资源的译介和现代主义文学美学的形成,都促使了人道主义理念和个体性、主体化的美学知识谱系不断走向中心化,曾经在“阶级斗争”时期被视为“颓废、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在新时期的“美学热”知识框架中一跃成为具有普世性和启蒙性的话语资源,代表着美学前沿的知识学资源和反抗机械反映论的有力工具。对于西方学术资源的译介和中国文学美学之间的关联,绝非是铺陈中西美学之间的差异,而是着重探究西学资源对中国美学发展进程的影响,以及在此背后的理论生成机制和意识形态特性,发掘中国“现代性”资源的特质与进程。作为一种“不对等”的文化传播方式,正存在着如伯曼所认为的“先进民族国家的现代主义”和“落后与欠发达的现代主义”之间的距离,中国新时期的“美学热”译介再次充当了具有文化症候性意味的代表。其中更是夹杂着告别历史的文化诉求、个人话语与主体性的建构、文化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反思等“异质性”特征。所以西学资源一方面成为工具性和知识性的知识资源;另一方面同“手稿热”、人道主义论争、主体性的确立等美学现象一起,构建了美学反思的意识形态诉求,给予了知识分子和文学青年以更大的言说空间。

参考文献:

- [1] 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M]. 北京:三联书店,2006:228.
- [2] 王晓明. 翻译的政治——从一个侧面看 80 年代的翻译运动[C]//[日]酒井直树. 印迹:第 1 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275.
- [3] 叶水夫.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务工作报告[J]. 外国文学研究,1981(1):13-18.
- [4] 木木. 一个陌生而混乱的世界——《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第一、二册)简评[J]. 外国文学研究,1983(1):109-113.
- [5] 柳鸣九. 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J]. 外国文学研究,1979(1):23-24.
- [6] 王宁. 西方文艺思潮与新时期中国文学[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4):51-60.
- [7] [法]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周煦良,汤永宽,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1.
- [8] 陈中亚. 我告别了存在主义[J]. 中国青年,1982(10):30-31.
- [9] [德]弗洛伊德. 创作者与白日梦(1908年)[C]//伍蠡甫. 现代西方文论选.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145-146.
- [10] 广东调查组. 国外社会文化思想对广东高校学生影响的调查与分析[M]//陆钦仪,李长喜,路建平. 西方思潮与大学生思想教育研究.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18.
- [11] 陆钦仪等. 积极引导青年学生正确对待现代西方哲学思潮[C]//陆钦仪,李长喜,路建平. 西方思潮与大学生思想教育研究.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90.
- [12] 王国维. 尼采氏之教育观[M]//王国维集:第 2 卷. 周锡山编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90.
- [13] 鲁迅. 文化偏至论[M]//鲁迅全集:第 1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2.
- [14] 汝信. 尼采的美学思想[M]//汝信文集.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437.
- [15] 张汝伦. 一个被误解的哲学家——尼采学说之我见[J]. 书林,1985(3):5-7.
- [16] 周国平. 尼采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N]. 中国青年报,1988-07-22(3).
- [17] 李劲民. 大学生中的‘尼采热’及其解析[J]. 青年研究,1988(12):30-35.
- [18] 李泽厚.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M]//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北京:三联书店,2008:6.

From Subject Discourse to Cultural Enlightenment: the Knowledge Pedigree of Aesthetics Translation Boom in the 1980s

PEI Xuan

(The Research Center of Literature Theory,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esthetics boom of 1980s, the modern western resources had fit into the grand context of liberation thought. The establishment of subject value and aesthetic sensibility, history reflection of individual, and so on, these not only becomes the modernist form of western aesthetics, but also become the theoretical pursuit of new period in China. Sartre, Nietzsche and Freud, all of them had make up the whole aesthetic dimension in the 1980s intellectual framework of translation boom. Sartre's existential aesthetic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nslation boom with strong philosophical concept and modern literature, had become bright spot in the humanism ideological trend; Freud's psychoanalysis represented by the subject's deep psychic activity, sexual life desires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of symptoms analysis, presented the subjective strong aesthetic appeara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Nietzsche had constructed another boom in the new period of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ccompanied by Nietzsche's philosophical disputes. At the same time, is also a philosophy of further deepening and make public of voluntarism and humanistic theory in China's. So the translation boom walked out of a word the theoretical spectrum from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o aesthetic ethical construction, and also has the history value of culture reflec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human.

Keywords: aesthetics boom; translation boom; existentialism; subjectivity;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沈建新)